

陇上学人文存

陈 涌 卷

陈 涌 著 郭国昌 编选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陇上学人文存. 陈涌卷 / 范鹏总主编; 陈涌著;
郭国昌编选.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226-04770-5

I. ①陇… II. ①范… ②陈… ③郭…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理论—文集 IV.
①C53②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 087423 号

出版人: 吉西平
责任编辑: 宋学娟
封面设计: 王林强

陇上学人文存·陈涌卷

范鹏 总主编

陈涌 著 郭国昌 编选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印张 15.375 插页 7 字数 385 千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978-7-226-04770-5 定价: 60.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印厂联系)



《陇上学人文存》第一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	陆 浩	刘伟平		
主 任：	励小捷	咸 辉		
副 主 任：	张建昌	张瑞民	范 鹏	
委 员：	张余胜	吉西平	魏胜文	高志凌
	张 炯	安文华	马廷旭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珽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 主 编：范 鹏
副总主编：魏胜文 马廷旭

《陇上学人文存》第二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	王三运	刘伟平		
主 任:	连 辑	咸 辉		
副 主 任:	张建昌	张瑞民	范 鹏	
委 员:	张余胜	吉西平	魏胜文	高志凌
	张 炯	安文华	马廷旭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珽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 主 编: 范 鹏
副总主编: 魏胜文 马廷旭

《陇上学人文存》第三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	王三运	刘伟平		
主任:	连辑	张广智		
副主任:	张建昌	范鹏	马成洋	
委员:	管钰年	吉西平	王福生	陈双梅
	朱智文	安文华	刘进军	马廷旭
	张亚杰	李树军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珽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主编: 范鹏

副总主编: 王福生 马廷旭

《陇上学人文存》第四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	王三运	刘伟平		
主任:	连 辑	夏红民		
副主任:	张建昌	范 鹏	高志凌	
委 员:	管钰年	吉西平	王福生	陈双梅
	朱智文	安文华	刘进军	马廷旭
	张亚杰	李树军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珽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 主 编: 范 鹏

副总主编: 王福生 马廷旭

总 序



陇者甘肃，历史悠久，文化醇厚。陇上学人，或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学者，或外来而其学术成就多产于甘肃者。学人是学术活动的主体，就《陇上学人文存》（以下简称《文存》）的选编范围而言，我们这里所说的学术主要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存》精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甘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的代表性著作，每人辑为一卷，或标时代之识，或为学问之精，或开风气之先，或补学科之白，均编者以为足以存当代而传后世之作。《文存》力求以此丛集荟萃的方式，全面立体地展示新中国为甘肃学术文化发展提供的良好环境和陇上学人不负新时代期望而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的新贡献，也力求呈现陇上学人所接续的先秦以来颇具地域特色的学根文脉。

陇原乃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人文学脉悠远隆盛，纯朴百姓崇文达理，文化氛围日渐浓厚，学术土壤积久而沃，在科学文化特别是人文学术领域的探索可远溯至伏羲时代，大地湾文化遗存、举世无双的甘肃彩陶、陇东早期周文化对农耕文明的贡献、秦先祖扫六合以统一中国，奠定了甘肃在中国文化史上始源性和奠基性的重要地位；汉唐盛世，甘肃作为中西交通的要道，内承中华主体文化熏陶，外接经中亚而来的异域文明，风云际会，相摩相荡，得天独厚而人才辈出，学术思想繁荣发达，为中华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代以来，甘肃相对于逐渐开放的东南沿海而言成为偏远之地，反而少受战乱影响，学术得以继续繁荣。抗日战争期间作为大



后方，接纳了不少内地著名学府和学者，使陇上学术空前活跃。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更是为国家民族的新生而欢欣鼓舞，全力投入到祖国新的学术事业之中，取得了一大批重要的研究成果，涌现出众多知名专家，在历史、文献、文学、民族、考古、美学、宗教等领域的研究均居全国前列，影响广泛而深远。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文社会科学几次对当代学术具有重大影响的争鸣，不仅都有甘肃学者的声音，而且在美学三大学派（客观派、主观派、关系派）、史学“五朵金花”（史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重点研究的历史分期、土地制度史、农民战争史等五个方面的重点问题）等领域，陇上学人成为十分引人注目的代表性人物。改革开放以来，甘肃学者更是如鱼得水，继承并发扬了关陇学人既注重学理求索又崇尚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形成了甘肃学者新的风范。宋代西北学者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乃中华学人贯通古今、一脉相承的文化使命，其本质正是发源于陇原的《易》之生生不已的刚健精神，《文存》乃此一精神在现代陇上得到了大力弘扬与传承的最佳证明。

《文存》启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在选择入编对象时，我们首先注重了两个代表性：一是代表性的学者，二是代表性的成果，欲以此构成一部个案式的甘肃当代学术史，亦以此传先贤学术命脉，为后进立治学标杆。此议为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首倡，随之得到政界主要领导、学界精英与社会各界广泛认同与政府大力支持，此宏愿因此而得以付诸实施。

为保证选编的权威性，编委会专门成立了由十几位省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著名学者组成的专家指导委员会，并通过召开专题会议研讨、发放推荐表格和学术机构、个人举荐等多种方式确定入选者。为使读者对作者的学术成就、治学特色和重要贡献有比较准确和全面的了解，在出版社选配业务精良的责任编辑的同时，编委会为每一卷配备了一位学术编辑，负责选编并撰写前言。由于我院已经完成《甘肃省志·社会科学志》（古代至1990年卷，1990至

2000年卷)的编辑出版工作,为《文存》的选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基本依据,加之同行专家对这一时期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研究,使《文存》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同期内甘肃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状况。

我们的愿望是坚持十年,《文存》年出十卷,到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达至百卷规模。若经努力此百卷终能完整问世,则从1949至2009年六十年间陇上学人以“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精神献身学术、追求真理的轨迹和脉络或可大体清晰。如此长卷宏图实为新中国六十年间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全部成果的一个缩影,亦为此期间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业绩的一次全面检阅,堪作后辈学者学习先贤的范本,是陇上学人献给祖国母亲的一份厚礼。此一理想若能实现,百卷巨著蔚为大观,《文存》和它所承载的学术精神必可存于当代,传之后世,陇上学人和学术亦可因此而无愧于我们所处的伟大时代,并有所报于生养我们的淳厚故土。

因我们眼界和学术水平的局限,选编过程中必定会出现未曾意料的问题,我们衷心期望读者能够及时教正,以使《文存》的后续选编工作日臻完善。

是为序。

2009年12月26日

编选前言

陈涌,原名杨思仲,我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文学评论家和鲁迅研究专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不同历史时期,陈涌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从事文艺理论、文学评论和鲁迅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1919年8月,陈涌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城一个破落的小资产阶级家庭,童年就经历了生活的艰辛。中学读书期间,受到具有革命思想的国文教师的熏陶和启蒙,开始阅读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作家作品,从中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缺乏关爱的“冷漠”,体会了“贫苦人的苦难”。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民族救亡潮流的推动下,陈涌怀抱革命理想于1938年秋天来到延安,先进入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接受培训,后转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毕业后任《解放日报》记者和文艺副刊编辑,从此与文学结下了不解情缘。新中国成立后,陈涌先在《人民文学》、《文艺报》等报刊任编辑,后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从事文艺理论、文学评论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鲁迅的著名学者。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陈涌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甘肃,任教于兰州艺术学院。兰州艺术学院撤销后,陈涌于1962年3月调入甘肃师范大学(现更名为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在甘肃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和文艺理论、鲁迅研究工作达20年之久。新时期



开始后,陈涌于1978年7月调回北京,先后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文艺组组长、《文艺理论与批评》主编。曾当选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和第四届理事会理事,担任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会长等职务。

一 “政治”、“人”、“美”兼容的文艺理论

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杰出成果,尽管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在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界整风运动期间发表的,但是其对中国文艺理论和中国文学发展道路的全面影响则是从1949年7月开始的。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不但确立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在中国文艺发展中的权威地位,而且也确定了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向。如同周扬的报告所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①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国作家协会以及其他省级相关机构的相继成立,在解放区得到局部实践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终于走向了全中国,成为所有文艺工作者遵循的基本准则,中国当代文艺完全是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规范下向前发展的。

正是在这种大一统的政治文化语境下,产生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陈涌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以陈涌为代表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大多经历了延安的文艺界整风

^①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513页。

运动,他们能够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理论,从文艺的特殊意识形态本质出发,强调政治对文艺的规范意义,注重文艺的宣传教育功能。他们能够从文艺与政治和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的真实性和倾向性等问题入手,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进行合理的阐释,由此形成自己关于文艺基本问题的看法。然而,由于“十七年”时期政治对文艺的强烈制约作用,决定了大多数文艺理论家未能从文艺的特殊性出发理解文艺创作及其发展潮流,过分夸大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忽视了文艺的相对独立性,最终导致了人们关于文艺问题认识上普遍的庸俗社会学倾向。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陈涌虽然服膺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但是他并未囿于指导中国当代文艺发展潮流的理论本身的限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教条化,而是从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创作实践出发,将文艺创作活动放在作家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中,以文艺作品自身的特点为中心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问题,发现文艺创作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复杂关联。面对新中国成立后蓬勃发展的中国当代文艺理论批评和研究工作,陈涌直言不讳地指出:

在我们的理论批评工作中,还存在着庸俗社会学的倾向。是否庸俗社会学便比唯心论好一些呢?可能有人会有这种想法。但实际上,庸俗社会学和唯心论同样都是违反真正的科学,违反马克思主义,危害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的。

庸俗社会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否认文学艺术的特殊的性质和任务,否认文学艺术有它自己不同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特殊的规律,而用一般社会的公式生吞活剥地代替对于文艺的具体生动的实践的研究。(《关于文学艺术特征



的一些问题》)

毫无疑问,文艺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倾向和文艺创作上的概念化倾向,都是根源于文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教条化认识。所谓的“一般社会的公式”,就是当时流行的“科学的认识是由具体到抽象,文艺的认识是由具体到抽象再回到具体”的看法,这是违背文艺研究和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的。因此,陈涌从事文艺理论研究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反对文艺理论批评工作中“存在着庸俗社会学的倾向”。从根本上来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也是一种文艺社会学理论,注重经济基础、阶级关系等外在的社会性因素对文艺创作及其发展潮流的决定性影响。然而,这并不是说文艺就没有自己的独立性,文艺就应该依附于经济基础及其特定的阶级关系的限制。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的文艺理论工作者却正是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一般原理理解文艺及其本质特征的,忽略了以文艺为代表的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及其独立性。在具体的文艺理论研究中,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还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其实都是带有根本性的基本原理,带有方法论的意义,文艺理论研究者完全可以从文艺创作的实际出发,探索文艺作品的艺术个性,从而得出符合文艺作品特点的艺术结论,不应当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

那么,如何消除文艺理论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倾向呢?在陈涌看来,应当从文艺的核心因素——“人”入手:“艺术家需要通过人,从人的思想感情上、道德上,——总之是从精神上的变化来表现现实生活的这个变化。”在把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奉为圭臬时代里,陈涌关于文艺本质及其属性的思考不能不说是深刻而独到的。事实上,无论人们如何强调文艺的政治意识形态属性,也无论人们如何注重文艺的宣传教育功能,最后必然会落实到“人”上。因为,

不管社会和时代如何变更,文艺是由作家创作的,“人”是文艺活动的出发点,也是文艺活动的归宿,文艺始终要为“人”服务。文艺即使为政治服务,也必经通过“人”去实现。也因此,陈涌认为:

文学艺术不但应该具有感性的特点,而且还应该有能力唤起人们的美感的特点;文学艺术的形象不但应该真实地反映生活,而且应该真实地反映出人们对于美的需要,反映出人们的美的理想。(《关于文学艺术特征的一些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人既有具体的物质需求,也有抽象的精神需要,文艺创作就是为了满足精神需求而进行的。与其他精神需求不同的是,文艺创作活动是以追求“美”为目标的,要能够“反映出人们对于美的需要,反映出人们的美的理想”。在文艺政治化的时代里,由于政治的影响力大大强于美学的影响力,尽管“美”是文艺活动的根本所在,但是人们常常更关注文艺活动中的政治因素,有意无意忽略了文艺的美学因素,最终导致文艺创作的概念化。

可以说,陈涌在对“近代和现代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的重要传统”进行思考的过程中,以自己对于文艺作品的体察,发现了文艺创作和文艺发展潮流的特殊性,其文艺理论的独特性就在于,他既没有完全从政治的立场去看待文艺的本质问题,也没有纯粹从美学的角度去理解文艺的艺术特征,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历史的”和“社会的”相结合的方法,将文艺创作看作是以“人”为中心的审美的历史活动。所以,陈涌说:

艺术的政治思想内容,艺术作品里所表现的作者的阶级倾向,也往往和艺术的特点分不开的。正因为文学艺术的对象主要是人,是人的生活和精神,因而关心人的问题,不但从政治上而且从道德上,从审美的观点上去认识、评价人和人的问题,已经成了文学艺术,特别是近代和现代的民主



和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的重要传统。（《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几个问题》）

“政治”、“人”、“美”是陈涌文艺理论的三个支点，这既是他对古今中外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潮流发展规律的总结，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认识。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发展中，强调文艺的政治性是时代的必然要求，“政治”是每一位文艺理论家必须面对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然而，在陈涌看来，文艺创作的“政治”又不是孤立存在的，是水和乳的交融，而不是水和油的分离。文艺和“政治”结合的道路有两条。第一条是“人”，就是说文艺的对象“主要是人，是人的生活和精神”。“十七年”时期文艺的种种缺陷和不足就是将“政治”看作是一条独立的“红线”抽离出来去要求“人”，“人”变成了没有精神和思想的抽象“政治”载体。第二条是“美”，就是说“美”是文艺的根本特点，失去了“美”文艺自然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此“美”是文艺活动的中心，但是对“美”的追求并不排斥文艺对政治的关注，也不拒绝文艺表现出应有的倾向性。其实，在任何时代里，文艺与政治都会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对于政治占据中心地位的“十七年”时期的文艺活动来说就更是如此。然而，陈涌却认为，文艺创作的核心问题不只是“从政治上”去关注人的问题，而且更应是“从道德上，从审美的观点上去认识人、评价人和人的问题。”可以说，陈涌看到了人的社会属性的多样性，指出了人与政治、道德、审美等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由此，陈涌也就自然看到了文艺创作不应该只是简单地服从“政治”，而是要揭示人的道德规范、审美追求，等等。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显示了陈涌文艺思想的独特性。

二 “与时俱进中注重艺术精神”的批评品格

陈涌的文艺批评活动虽然是从解放区文艺运动时期开始的，但